

行西方民主的後果及張冠練戴

——回應練乙錚

去年底，筆者在《明報》刊登《西方民主制度是靈丹妙藥還是興奮劑》及《民主是激情專制》兩文，引來《信報》前主筆及中策組前顧問練乙錚博士為文指正（見1月9日《譚志源斷章取義 王卓祺張冠練戴》，下稱「練文」）。筆者與練博士有數面之交，亦是筆者現職崗位的前任顧問，故就練博士兩點意見作出回應。

「練文」第一點指出西方學者傳統重視批判，尤其要對主流現況說三道四，潛台詞是筆者不用大驚小怪，引用西方主流政治學者論證西方民主制度的問題；言下之意，多講西方民主問題是多餘的。練博士亦指出法國人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國之旅，對美式民主移植法國的保留態度。

練博士這種行文風格令筆者十分費解，一方面練博士敬佩西方學者的批判精神，亦認同硬套西方民主制度的問題；另一方面行文卻揶揄筆者斗膽套用西方主流政治學者論據對民主說三道四。這是否只容許西方尊貴的主流學者批判，我們東方的卑微學者及研究人員只可沉默是金，做駝鳥，照單全收西方民主制度呢？

同時，練博士學托氏之文，卻對其核心思想「多數人的暴政」隻字不提，實對本人就民主議題展開討論的用心捉錯用神。托氏的用意在於單單追求民主制度及硬件，忽視其他支撐民主的元素，如多元主義等，同樣會帶來重大的社會問題。這種實際上是「有形而無神」的民主，毫不穩固，此所以世界各地出現多次民主倒退潮的一大原因。本人在過往兩篇文章引用不少國際例子，旨在拋磚引玉，指出追求西方民主制度，同時要反思、深思民主帶來的問題，以免墮入前人的誤區及重複失敗經驗。

行西方民主制度須了解後果

筆者要請教練博士，香港社會在政治制度的發展問題出現爭議，做研究求學問的人是否有責任作出探索？當然，筆者可以藏拙。不過，最後還是認為政府官員，尤其中策組屬於智庫型組織，就相關議題向公眾解釋政策的背景及問題是應有之義；沒有就相關議題及理念進行梳理而急着推行一套未經深思熟慮的民主制度，此非香港之福，亦是作為學者、研究人員的失責。

如果筆者沒有解讀錯誤的話，香港社會上有一批人，包括學者及議員，認為引入普選便可解決政治認受性及管治問題。這亦是《明報》編者出「民主是否靈丹妙藥」題目予筆者撰文的原因。但這一種社會主流意見與筆者回顧文獻時的發現並不吻合，對民主發展的複雜過程看得過分簡單。

筆者近月閱讀西方學者論述民主，尤其有關「民主化浪潮」（democratization waves）的



■香港應否全盤引入西方模式的民主選舉制度，是政改其中一個爭論點。

漲潮及退潮時，感覺十分不快。為什麼呢？遠的例子是民主化第一波退潮在歐洲一、二次大戰期間發生，亨廷頓的研究顯示，民主政體從1922年的二十九個國家，到1942年僅餘十二個。明顯突出的是德國，民選了一位獨裁者希特拉，造就了歐洲及世界的人類災難。近的是「阿拉伯之春」，埃及民選政府不及一年已經被群眾推下台了。這些發展民主的血的經驗，是否有助香港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作為借鑑呢？

筆者不是大智大慧如練博士，冷眼看世界，指點江山。筆者從事研究戰戰兢兢之餘，還保留一點火，覺得既然倡導民主化的人士不談論民主制度的優劣和後果，只是不斷重複如果沒有普選，香港便會出現管治危機。不過，他們卻視而不見，香港的半民主選舉出來的立法會民望十分低，議員質素良莠不齊；亦有輿論大不敬地形容立法會為「垃圾會」。這是什麼原因？應該不是純屬個人因素。選票民主起了什麼作用呢？香港議會的問題有普遍性嗎？美國議會的代議士一樣不濟。

最近，美國前總統布殊的最後一任，亦是奧巴馬的首任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出版回憶錄，形容多數美國國會議員是眼光狹隘、不勝任、粗魯、容易生氣、自私自利及虛偽的（《經濟學人》，2014年1月11日，第33頁）。這些形容詞何等刻薄！這不是證明如果香港社會未有充分評估選票民主的後果，期望太高，將來失望更大！當然，以筆者一人之力難以做到期望管理。不過，筆者還有一點傳統知識分子的執着，就是盡一己的言責。

「選票民主」與「選舉民主」之辨

練博士為文指正筆者借用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的想法，以「投票箱」的「多數決」制度稱之為「選票民主」，是筆者「張冠練戴」。他認為西方政治學早就有「選舉投票箱」作為西式民主的標誌，不可能是邵善波首創的，並由此質疑為何連這點基本常識也沒有，在中策組領導五位博士做研究，「怎麼可以疏忽了這點？」

不過，練博士這一批評是有所曲解及過分放

大了。筆者文章中從來沒有用英語「electoral democracy」，我的用詞是「voting booth democracy」，中文亦未用過「選舉民主」一詞。「選舉民主」與「選票民主」兩詞表面上有點相似，但選舉（election）較選票（vote）闊，除了投票箱投票外，還有選舉制度的設計；而用「voting booth」是形象化投票這一行為而已，以突出西式民主已簡化到每隔一段時間才有得選，其餘由代議士及政府包攬的間接民主的基本特性。邵先生也曾考慮「voting booth」譯為「票決」，最後還是用「選票」兩字。看來，練博士是張冠練戴了！

其實，民主有直接民主、間接民主、協商民主等不同概念及制度。筆者《民主是激情專制》一文引用美國聯邦人論文，指出沒有單一政體是完美的。這表示筆者不單批評西方民主，亦對君權及權貴政治有意見。不過，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適合當地情況，不應照搬所謂西方模式。雖然練博士亦認同本人在此前兩篇文章有很多正確之處，但又不進一步指出其所謂「關鍵錯誤」，而只執拗於字眼，是學術爭論上一種「見樹而不見林」的表現。期望練博士有空時多作概念上的交流。

做研究首先是態度認真，對概念的掌握及其操作化都是基本功；但人始終是會犯錯的，或能力有限、野心太大。筆者建議的補救辦法是虛心翻查多幾本書，請教多幾位專家學者，減少出錯的機會，以及對研究問題的弱點及限制有合理的解釋而已。不過，個人榮譽得失還是次要，求學問做研究的目的，還是希望社會前進、國家興盛。這些都是近百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共有的心願及奮鬥的目標。

最近翻看余英時一篇有關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文章，與練博士共勉。余教授說：「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就是對自我內在的批判，只會批判別人。接受西方某一家之言後便認為絕對真理，借以批判他人。」筆者兩篇文章故意全部引用西方主流學者的言論理據，有沒有深意要大家猜想了！

作者為中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